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传统与现代

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年

王雪萍 ◆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求是

传统与现代

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年

王雪萍◆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年 / 王雪萍主编.
编.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 丁立群，
李小娟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354 - 8
I. ①传… II. ①王… III. ①史学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K0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337 号

书 名	传统与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年
著作责任者	王雪萍 主编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张怀宇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34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354 - 8
定 价	4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求索与坚守

——纪念《求是学刊》发刊 200 期

已过“而立之年”的《求是学刊》，带着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荣誉，迎来了发刊第 200 期的重要时刻。作为《求是学刊》一直的读者、20 多年的作者，特别是曾经 8 年的编者，我不仅为她日积月累的成果和荣誉而高兴，更为她始终不渝的精神特质而感动，这就是：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

记得 1990 年我作为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开始成为《求是学刊》的一个编者时，适逢《求是学刊》公开发行十周年，我在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纪念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清楚地表述了《求是学刊》的基本定位：

一本杂志的刊名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从选定现有刊名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劳作将同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真理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唯实、求是、图新将是我们永恒的座右铭。十年的心血、十年的求索，贯穿着始终如一的旨趣：求是！

令人十分欣喜的是，又过去了 20 年，《求是学刊》的这一学术品位和精神追求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已经发扬光大为自己鲜明的办刊特色。必须指出，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高尚的精神无疑在任何时代都会被人们所推崇、所崇敬，但是，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精神和真理保持敬畏而不为其他的因素所动心，无论对于一个人、一本杂志、一个学科领域，都是难能可贵的。距今差不多 200 年前（1816 年），大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得堡大学所做的《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中就已经感叹道：“时代的

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①在今天日益丰富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经济的、行政的、人情的和其他非学术的因素,从不同方面挤压着学者的研究和杂志的办刊活动,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排除各种干扰,坚守学术尺度和学术品位,更是需要毅力和定力。

因此,黑格尔呼唤一个“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的时代,期待年青一代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黑格尔强调:“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②

黑格尔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穿越了近200年的历史时空,今天依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守望精神的灵性,坚守学术的神圣,并非是在追求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渴望着对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精髓的自觉传承。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类的足迹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无非有两种东西:自发的文化传统和自觉的文化精神。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历史意识的觉醒,这种自觉地透视人类历史发展内涵、自觉地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性的文化精神,越来越成为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我一直认为,杂志或期刊为自觉文化精神的生成、培育和传承提供了最好的寓所、平台、载体或温床。1665年1月5日法国的戴·萨罗在巴黎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本期刊就是《学者杂志》。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虽然杂志或期刊已经演变为多种类型,但是,学术期刊毫无疑问一直是最典型的、最有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影响力的杂志,这同它与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联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Magazine”(“期刊”或“杂志”)一词源自法文 Magasin,原意为“仓库”、“知识的仓库”或“军用品供应库”等。但是,真正的学术刊物显然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知识的“仓库”,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精神得以生成的历史地平线,是人类文明的自觉的守望者。

由此不难看出,《求是学刊》的精神追求和学术品位,并没有使之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而是使之在更高的层面上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我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

世纪之交将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希望和新的使命。

彼此冲突的人类理性将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进行一场伟大的知识整合运动;四分五裂的人类历史将汇入马克思所预见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程。而我们历经磨难的民族将逐步告别贫穷与落后的历史,踏上伟大的总体性的现代化的征程。总体性的现代化呼唤着总体性的理论。我们将同我们的读者和作者一道,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来迎接这一伟大的时代。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也不应是灰色的。大变革时代的理论不是黄昏时才起飞的“密纳瓦的猫头鹰”,而是那传说中神奇的“风鸟”,她将为一个新时代报晓,也将为之献身。置身于伟大的人类知识整合运动之中,为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而尽心竭力,这将是唯实、求是、图新的宗旨。

翻开《求是学刊》的200期学术长卷,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和思维科学探索,到世纪之交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构,从文学批评、历史反思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处处透露出这一学术期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穿透。

不仅如此,我在这里还想进一步挖掘出《求是学刊》更深层的学术追求。应当说,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不只是《求是学刊》的定位和办刊特色,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之林中,还有很多有影响的杂志,具有同样的追求和类似的定位。我想说的是,在《求是学刊》的学术定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并继续培育更加值得珍视的精神特质和学术品格。具体说来,主要有二:一是正在走向自觉的“刊物的主体意识”;二是

正在开启的“刊物的国际视野”。

我在谈论“刊物的主体意识”时,是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我们在强调杂志或期刊的学术品位时,可以展示出不同的境界和追求。例如,我们可以突出学术期刊的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对于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观点,不加限制地给予同等表达的机会,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可以强调刊物本身的选择性,而不把刊物当做“安放文章的空架子”,这就是说,我们强调刊物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要主动创造和引领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域的学术理论热点,积极地推动理论创新,自觉地培育学术流派和理论精神。后一种追求或境界显然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付出更多的艰难探索和精神劳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但是,它一旦获得突破,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显然会更大。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和发展。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多次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一学术杂志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成为几代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的主要阵地,形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和社会历史理论流派。从第一代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经第二代中坚布罗代尔,到第三代代表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提出的微观史学理论范式深刻影响了欧美的历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

《求是学刊》在这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其典型的研究领域就是文化哲学。1992年《求是学刊》率先在期刊界推出“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学术研究专栏,此后又先后设立“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等系列专栏,培养了一批文化哲学研究者,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文化哲学学术中心,并逐步形成了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历史批判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视野,自觉地提出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和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尽管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并极大地带动和引领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走向。

至于“刊物的国际视野”,显然不难理解,它强调的是:在全球化、信

息化时代,学术研究和学术刊物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所有民族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用茨威格的话说,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中,尽管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依旧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凸显中国特色,但是,无论要使我们的理论思考切中中国的现实,还是要廓清世界的变局,都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形成开放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求是学刊》有自觉的思考,从本世纪初,就积极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并在学术期刊界率先开设了“海外来稿”专栏,致力于国内外学术交流,为国内外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搭建一个学术平台,促进学术期刊不断走向国际,探索开放式、国际化办刊的路径。这一栏目同样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我深知,《求是学刊》还很年轻,她的许多探索还处于初始的阶段,还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是她的缺点和弱点,而是她的希望、她的开放的未来。精神的追求和学术的探索原本就“总在途中”,真理的探求是永远图新永远不老的神圣事业,更是扎扎实实默默无闻永无止境的辛勤劳作。只要我们不懈地求索,只要我们不变地坚守,就会有越来越广阔的理论地平线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开启。我还是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的话来作为这篇随笔的一个“结语”:

我们深知,历史不会只呈现玫瑰色,真理更不会一蹴而就,在我们有限的才能与宏伟的历史使命之间横着单凭我们自身很难逾越的时空。但我们坚信,我们同读者和作者的辛勤劳作,无论如何平凡,都不会毫无价值。“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泰戈尔)我们愿以自己的平凡换取真理的非凡,我们愿以自己的默默无闻换取真理的无穷感召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谨以此寥寥数语来纪念《求是学刊》发刊200期,我更愿意把这篇随笔看做自己学术跋涉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愿与《求是学刊》以及更多的学术期刊一道在精神世界中继续上下求索,为我们时代的破浪前行自觉地彰显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2011年1月6日
北京

目录

上编 史学史专题

- 3 / 瞿林东 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
- 19 / 徐国利 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述论
- 32 / 罗炳良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 45 / 张 越 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
- 53 / 邓京力 事实与价值的纠葛
——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
- 62 / 晁天义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 77 / 乔治忠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
- 93 / 汪高鑫 论白寿彝先生对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 107 / 向燕南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 119 / 谢保成 《史记》体系再考察
- 135 / 韩东育 日本“京学派”神道叙事中的朱子学
- 146 / 章益国 史学艺术性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 156 / 汤勤福 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题
- 167 / 蒋重跃 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
- 181 / 瞿林东 略说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

下编 中国史专题

- 197 / 南炳文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 207 / 杜家骥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 222 / 庞乃明 利玛窦与明人欧洲观的初步形成
- 236 / 罗冬阳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 251 / 赵克生 明代生祠现象探析
- 261 / 林延清 明朝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
- 274 / 赵轶峰 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制度变迁
- 289 / 原祖杰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 299 / 宋洪兵 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
- 315 / 柴文华 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潮及其反思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
- 324 / 俞祖华,赵慧峰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
——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 340 / 高艳林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 352 / 李裕民 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
- 359 / 何忠礼 官僚士大夫政治体制的确立:宋前期的制度革新及其影响
- 368 / 柳平生,葛金芳 宋代经济成就: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与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 378 / 范立舟 从学派林立到理学独尊:空前活跃的宋代思想学术及其影响
- 387 / 路育松 试论北宋忠节观建设的成效
——以楚政权和南宋建立为中心的考察
- 398 / 王 剑 “奸臣”与“奸帝”:陈瑛与明成祖关系论
- 414 / 刘晓东 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
——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
- 426 / 常建华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
——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 440 / 后 记

史学史专题

上编

跨入 21 世纪的传统史学在继续挖掘史学遗产的基础上,更加凸显其“彰往而察来”的当代意识。不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辨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而且体恤生民、关注时势的史家情怀在具体史学求索中更表现为多重视阈和多重纬度。同时,新世纪的传统史学在研究取向上不仅继续关注史家、史著和史学发展过程等领域,也注重对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史学家的气度与修养方面的研究,从而使新世纪传统史学研究显示出历史理论的内在底蕴。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在新世纪仍属重要拓展领域。中外史学的会通研究渊源于 20 世纪初,其流洪在 80 年代后渐趋强大,新世纪的中外史学比较依然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从史家、史著、史学思潮的比较转向中外史学精神的深层解析。传统史学研究中的社会价值取向在新世纪亦得到坚持。传统史学提倡彰善瘅恶、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取向。新世纪传统史学研究尽管是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进行的,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传统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密切关注,注重传统史学的社会功用以及启迪人类智慧的社会价值取向,依旧成为学者的治学宏旨。本编所选取的文章正是上述趋势的反映。它们既有对传统史学人文精神、进化史观、正统史论等内容的分析,也有对史学家的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探索,从中也能发现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广阔视阈和理论自觉。

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

瞿林东

近些年来,关于科学、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日渐多了起来,人们对此关注的热情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方面的讨论,有益于人们逐渐培养起更加科学的学风,有益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进而有益于增进各项工作决策的科学程度,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新世纪刚刚揭开序幕,大家进一步来讨论科学观、人文观及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问题,自然使其带有时代的气息。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有关问题讲几点认识,或许对这一讨论有拾遗补阙的作用。

一、史学与人文

关于人文,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等,或者用“文化”来概括这些方面。至于史学,人们似乎讲得不多。其实,我们所讲的“文化”,其中有许多方面、许多内容都离不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离不开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说离不开史学。

“人文”一词,中国出现较早,《易·贲象》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疏解释“人文”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据此,所谓“人文”当与制度、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又《后汉书·公孙瓒传》后论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之说,李贤注曰:“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

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李贤注把“人文”解释为“人事”，针对《后汉书》史论来说无疑是确切的，但它又引“《易》曰”作根据，这就把《易·贲象》中所说的“人文”的含义变得更宽泛了。本文讨论人文，兼采孔疏与李注二说，不作绝对对待。笔者这个认识也是有根据的。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讲到典制体通史的时候，曾用了“事实人文”这个概念。他还写道：“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传。”^①他讲的“事实人文”，当是包含一般史事和各种制度。他说的“通史人文”，当是指用通史体例撰写的制度史。当然，章学诚只是在论述“通史”体例时提到“人文”这个概念，并没有对其作任何解释，但我们根据上下文的联系，大致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人文”的含义。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同人性与教育相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研究同神学研究相对立，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是万物的主宰。这是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人们都懂得的一种世界观。

尽管中西产生“人文”这个概念的历史条件有很大悬殊，也存在具体表述的差别，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的，这就是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化（教育）的社会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使我们今天在讨论有关“人文”的话题时，思路就会更开阔，内涵也会更丰富。这里，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予以强调的，即由于中国古代史学至为发达，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在史学中有突出的和连续性的表现，这是西文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上面这些认识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探讨中国史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种种表现，将有益于丰富人们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有益于继承和发扬这种人文精神，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举例说来，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自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其特点是历史感同时代感的结合，是在对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中华书局1961年版。

二、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

发现并不断加深认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人文精神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方面。中国史学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的和重要的意义。

当然,中国先民也是从“天命”、“上帝”的羁绊下逐步挣脱出来的。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至人们的福祸寿夭,都由“天命”决定。这方面的记载,在先秦的官文书和王朝颂诗等文献中,俯拾即是。“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人世间的主宰。“人”也是当时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最初不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人君。《尚书·大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这里的“宁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谓: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这是较早把“天”与“人”连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种见解的,表明人是从属于天的。当时对一般人只称做“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谓:“天生蒸民”^①,“天亦哀于四方民”^②。后来经过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人的作用被进一步肯定,“人”的涵义扩大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的私人历史撰述《春秋》与《左传》、《国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人”了,也记载了一些人对“天命”的怀疑。《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重视人事的著作,它认真地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③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史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左传》记周内史的话,说“吉凶由人”^④,记郑国大夫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⑤《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

① 《诗经·大雅·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② 《尚书·召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论语·述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④ 《左传·僖公十六年》,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⑤ 《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写出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这些都反映了它们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战国以后，在历史思想领域，人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突出。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天命”受到怀疑，人事受到重视，已是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扼制的潮流。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发展上有划时代意义。他批评项羽兵败身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①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也？”这表明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是一位对“天命”史观大胆怀疑的史家。《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来看待的伟大著作，它对历史变化的动因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史记》在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显地宣扬“天命”的皇朝史，但它们毕竟都是着眼于写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其称说“天命”，固然有真诚的，但不少都是属于官样文章了。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他断然指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②。刘知幾并不是彻底否认“天道”，但他说的“天道”显然已包含了不少属于自然现象的因素。不论属于何种情况，他认为凡属于“天道”范围者，史家应取“不复系乎人事”的态度。刘知幾从他的朴素唯物思想倾向出发，把“天道”、“人事”的关系作为历史撰述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其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另一位史学批评家、思想家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天人相分”的学说，对“天”作了物质的阐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从而也就否定了“天命”史观。他指出：“天地，大果蓏也；天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

①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刘知幾：《史通·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愈大谬矣。”^①自司马迁提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念表示怀疑以后，到柳宗元上述论点，可以说是逐步把作为至上神的“天”从人们的历史观念中驱除出去的过程，这在“天”与“人”及天人关系之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历史思想发展上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史学中，在探索“天命”与“人事”对于历史的关系时，随着对“天命”的怀疑和对“人事”的重视，便萌生了从人世间寻求历史变动原因的思考。春秋时期的史官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②史墨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认识到，自古以来，掌管国家权力的人没有不变的，君与臣的位置没有不变的；他还用自然界的变化来证明自己的见解。史墨的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石破天惊。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只能以陵、谷的变迁来加以比喻。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并且认为应当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事势之流，相激使然”^③等方面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这是明确指出了社会历史的转化、变化，是人事和时势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故不足为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还说到，他著《史记》上起黄帝、下至当世，“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个“理”，即主要是指“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的真相。柳宗元和王夫之发展了以往历史思想中关于“势”、“事势”的思想，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势”有精辟的阐述，王夫之说“理”即“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④。王夫之所说的“理”不同于司马迁说的那些具体的道理，而是指事物自身发展的法则。要之，从“天命”到“人事”，从“事势”、“时势”到“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的“理”，这是古代史家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轨迹。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中提出“求顺于理”，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终于从具体的“理”升华到抽象的“理”，成为古代史学之历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

古代史家在探讨历史变化动因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长期为之困惑

①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16，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中华书局1975年版。